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Есенин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ИХИ ЕСЕНИНА

叶赛宁诗选

[苏联] 叶赛宁 著
顾蕴璞 译



文学名著
文列

Есенин

叶赛宁诗选

[苏联]叶赛宁 著
顾蕴璞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赛宁诗选／(苏联)叶赛宁(Есенин,С.)著;顾蕴璞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0
(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Избранные стихи Есенина
ISBN 7-80567-983-5

I.叶… II.①叶… ②顾… III.诗歌-作品集-苏联-现代
IV.I5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35064号

书 名 叶赛宁诗选
作 者 [苏联]叶赛宁
译 者 顾蕴璞
责任编辑 陈肇芬
原文出版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исатель》,1994г.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4.125
插 页 4
字 数 420千
版 次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80567-983-5/I·619
定 价 (软精装)18.5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忧国忧天的诗杰叶赛宁

顾蕴璞

和民族的同根,和时代的同步——大自然的挚友、歌手和
殉道者——由历史来评说的独特个性

和民族同根,和时代同步

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叶赛宁(一八九五——一九二五),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杰出的俄罗斯诗人。经过革命风暴的洗礼和艺术探索的跋涉,他历尽坎坷而终于在思想上从向往古老传统和恋土怀乡的“乡村最后一个诗人”,成为热情讴歌“苏维埃俄罗斯”的民族诗人和时代歌手;在艺术上则博采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等多种艺术流派之长而自成“叶赛宁意象体系”,对现代苏联诗歌,特别是抒情诗产生了承前启后的重大影响,与马雅可夫斯基同步地构成了苏联诗歌开创时期两种最有代表性的传统和倾向: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主要为革命伴奏,叶赛宁诗弦上跳动的主要音符是家乡、祖国、人性和爱情;马雅可夫斯基以叙事诗和讽刺诗著称,叶赛宁以即景诗和爱情诗见长;马雅可夫斯基风格的基调是雄浑、激越、响亮;叶赛宁风格的主旋是清新、沉郁、轻柔。

叶赛宁出生在梁赞省梁赞县康斯坦丁诺沃村一个农民家庭。他从两岁起就寄养在外祖父家里,外祖父是个精明强干的富农,见多识广。他很宠爱小外孙,常给他讲《圣经》故事和唱古朴的民歌。娇惯他的外祖母也是个讲故事的能手。这对叶赛宁构成了一个启

蒙的文学环境。家乡傍靠的葱郁的森林、清澈的奥卡河、丰美的黑麦田和青草地，在诗人幼小的心灵里孕育出了诗情画意，使他从八九岁起就迷上了诗歌，模仿民谣体写起诗来。无怪乎诗人在他后来的作品中能“那么出色地捕捉到了俄罗斯的乡土气息”（帕斯捷尔纳克语）。

叶赛宁诗才初露锋芒是在他进入斯巴斯-克列皮克教会师范学校（一九〇九）之后，在15岁（一九一〇）那年就写出了一些称得上杰作的抒情诗（如《湖面上织出了朝霞的锦衣……》等），向俄罗斯诗坛连连发出一颗新星即将升起的最早信息。一九一二年从教会师范学校毕业后，他便首次离乡入城，到莫斯科去找当店员的父亲，当了书店的伙计，后因不愿顺从女店主的使唤被解雇还乡。一九一三年他再度去莫斯科，当了印刷厂的助理校对员。在此期间，他参加了苏里科夫文学与音乐小组这个青年工农作家组织，经常在工人中散发传单，参加工人的集会，曾为此遭到警察的盯梢和搜查。工人和大学生的与日俱增的革命情绪，在当时叶赛宁的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如诗人在一九一四年的《真理之路》（为《真理报》的前身）上发表的政治抒情诗《铁匠》中唱道：

在勇敢、严峻的眼神里，
闪烁着彩虹般的火光，
宛如雄鹰振翼腾起，
准备飞向大海的远方。
炼吧，重重的锤吧，铁匠，
任汗水顺脸颊流淌。
你的心已被烈火点燃，
赶跑了苦难和忧伤。

诗中流露出工人的觉醒，洋溢着劳动的豪情，充满了对自由的

向往。但这类诗在叶赛宁的笔下只是涓涓细流，乡村诗，而且主要是身居城市后回忆家乡和童年的诗篇才是他灵感奔涌的浩浩大江。特别是当他进了沙尼亚夫斯基人民大学，补修了历史、哲学等课程以后，文化素养提高了，对艺术的追求更为迫切了，但对当时热火朝天的政治斗争却疏远了，他更多地沉浸在对童年时代身临其境的宗法制农村的缅怀之中，接连写出不少清新优美的乡村抒情诗，使当时一向鄙薄农村的都市文艺沙龙刮目相看，给俄罗斯诗坛吹进了一股复苏艺术活力的清风。如他在一九一四年一月号的《小天地》杂志上发表的处女作《白桦》，将象征与比喻相融合，描绘了大自然的美丽与朝气，颂赞了青春和俄罗斯。

一九一五年，叶赛宁从莫斯科专程到彼得格勒拜会大诗人勃洛克，被勃洛克视为“才气横溢的农民诗人”。通过勃洛克的介绍，叶赛宁认识了阿克梅派诗人戈罗杰茨基，经过后者的介绍，又结识了缅怀宗法制并迷恋民歌风的克留耶夫，受到一定的影响。叶赛宁后来在《我的小传》（一九二五）中写道：“当代诗人中我喜欢的是勃洛克、别雷和克留耶夫。别雷在形式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而勃洛克和克留耶夫则教会了我怎样抒情。”

一九一六年，叶赛宁应征入伍，在皇村服役，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才离开军队。这段历史后来反映在长诗《安娜·斯涅金娜》的抒情主人公的经历里，说明他当时是出于无奈，被迫从命的。一九一六年，叶赛宁发表了第一本诗集《亡灵节》（一译《扫墓日》），它标志着诗人的创作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在俄罗斯诗坛上牢牢站稳了脚跟。《亡灵节》里有一些诗虽取材于宗教形象，但叶赛宁从创作一开始便是人道主义者，而不是神灵膜拜者，他运用宗教形象和宗教象征来形象地阐发生活的哲理。如《上帝试探人们是否有善心……》一诗的主题是哀叹人间疾苦，而不是寻求天国幸福。有些描绘农民祈求上帝给消灾解难的诗，只是为了表现民间的生活风情，有的甚至有亵渎神灵的倾向。

在叶赛宁早期的抒情诗里,对祖国和家乡如痴似醉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是通过彩霞、明月、白雪、鲜花、芳草、林莽、清流、原野、山冈等千姿百态似通人性的物象表现出来的,诗中大自然的美与诗人恋乡爱国之情达到了物我难分的境界,赋予了叶赛宁的诗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从此,叶赛宁便以俄罗斯土地的魅力撼动着苏联、俄罗斯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弦:

假如天兵朝着我喊叫:

“快抛弃俄罗斯,住进天国!”

我一定要说:“天国我不要,

只须给我自己的祖国。”

——《你多美,罗斯,我亲爱的罗斯……》

在以赞歌和欢曲为主旋律的叶赛宁早期乡村诗中,也有稍许作品笼罩着哀愁的薄雾,它们唱出了诗人在目睹美丽的田园遭到冷落和荒芜后发出的惋惜的声音(如《你是我背离了的故乡……》),但是一般都缺乏思想深度。在表现农民的痛苦方面甚至还没有赶上他的前人涅克拉索夫,因为“诗人的忧郁还未升华为对社会抗议的感情,虽然在战争年代俄罗斯的农村已弥漫着革命的风云,孕育着社会的震荡”。^①但叶赛宁在回避现实向他所提出的紧迫问题的同时,对人生、爱情、友谊等永恒主题却有了自己独特的开掘。如那首用人化自然与物化情思、象征与白描相结合的手法所写的《狗之歌》,抒写一条刚下了七只狗崽的母狗在短短一天之内的悲喜祸福,使高尔基听后也为之叫绝,他“不由得想到,谢尔盖·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毋宁说是造化特意为诗歌,为表达绵绵不绝的

^① 见《叶赛宁评价及诗选》(北大俄语系)中所载维霍采夫《苏联文学史》的叶赛宁专论(第42页)。

‘田野的悲哀’，表达对一切动物的爱和怜悯之心（人比万物更配领受它）而制造出的一架管风琴”。

在奠定诗人一生创作基础的早期，除字字珠玑的抒情小诗撩拨读者的情思外，一些以历史为题材的短篇叙事诗（叶赛宁后来称它为“小叙事诗”）也比较脍炙人口，如小叙事诗《叶甫巴季·柯洛弗拉特之歌》（一九一二）、《地方行政长官玛尔法》等。前者描写一个抗击鞑靼侵略军，奋战到最后一息的民族英雄，后者则反映十五世纪后半叶诺夫戈罗德反对莫斯科公国的激烈斗争。与这一时期歌舞升平的田园抒情诗迥然不同，历史题材的叙事诗往往飘散着血雨腥风。

革命是诗人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说，他在革命前写的诗篇充满了对古老传统的依恋，那么，他在革命即将来临和到来之后不久所写的诗便充满了对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憧憬。这类作品有：迎接“庄稼汉天堂”的《八重赞美诗》（一九一七）、《决裂》（一九一七）等和讴歌十月革命的《变容节》（一九一七）、《约旦河的鸽子》（一九一八）、《乐土》（一九一八）、《天上的鼓手》（一九一八）等。这些诗与早期的抒情方式的差别在于立意奇特，想像瑰丽，气势宏大。如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称赞的名句：

天空像一口大钟，
月亮是它的钟舌。
祖国是我的母亲，
我是布尔什维克。

——《约旦河的鸽子》

又如：

天上的星斗缤纷如落叶，

汇入我们的江河流水。

啊，天上的和人间的

革命万岁，革命万岁！

——《天上的鼓手》

对于一个一向将自己的视角和感受囿于乡土田园的诗人来说，上述诗中那种叱咤风云的气概和献身革命的决心无疑是一大飞跃，证明叶赛宁正想从乡村诗人向革命诗人转变，事实上也确实如他自己后来在自传中所说的，他在“革命的年代完全站在革命的一边”。但这种美好的主观愿望，很快地就跟严峻的客观现实相脱节。他的“庄稼汉天堂”的美梦，在城市的“铁的魔爪”的撕裂下成了泡影，他顿觉诗的灵感也将随大自然同遭厄运，惶惶不可终日。怅惘之余的叶赛宁如丧家之犬到处游荡，出没于莫斯科的小酒馆借酒浇愁，与俄国意象派的一些风流名士为伍。从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年，诗人经历了一个“精神危机”时期，他把自己的失望苦闷的情绪倾泄在爱情组诗《莫斯科酒馆之音》中。这一时期所写的诗篇《四旬祭》把乡村比作一头枉然与火车（城市与工业的象征）匹敌的红鬃马驹，而在《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中则流露了与自然经济的田园诀别的哀婉之情。叶赛宁思想迷误期间所写的这类作品（包括他的绝笔诗），曾在青年中造成不良的影响，在诗人去世后的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间受到评论界的批评。但一些批评者不良莠地给叶赛宁的作品统统贴上“叶赛宁情调”的标签，实际上把诗人的优秀诗歌遗产也打入冷宫。这一现象到五十年代中期才得到匡正。

十月革命是俄国新旧社会和新旧思想交替的转折点，这时仅仅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叶赛宁在各种观点、思潮、流派争斗的漩涡里寻找自我。一九一五年他求教于象征派诗人勃洛克，同年开始与阿克梅派诗人戈罗杰茨基来往，一九一七年与左翼社会党人接

近,一九一八年与无产阶级文化派有了接触,一九一九年又结识了“西徐亚人”团体中的一些文学家(如别雷),同年在意象派宣言上签名,被推为该派的首领。然而诗人在艺术探索上从不随遇而安,一经发觉与这些派别的分歧,便先后一一离开或退出,这特别表现在对待俄国意象派上。叶赛宁虽然一贯重视形象的更新和开掘,认为它是“人与大自然的主要结点”,是“开启人的宇宙殿堂般心灵的钥匙”(《玛丽亚的钥匙》),但对俄国意象派同行们的“语言和形象就是一切”的观点始终不肯苟同。一九二一年叶赛宁著文《艺术与生活》正式亮明了自己与他们的分歧,并很快从组织上与他们决裂。因此,意象派的影响对于叶赛宁的创作而言是艺术大于思想,如他的诗剧《普加乔夫》(一九二〇—一九二一),虽被打上了一味追求意象新奇的烙印,但它并未与俄国文学的人民性传统以及普希金的美学思想相悖逆,而是有力地歌颂了俄国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和争取自由的光荣传统。这是苏联革命后从探讨农民在革命中的命运这一视角反映人民群众觉醒过程的一部别有新意的力作,其思想深度超过了普希金的以普加乔夫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

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苏联的城乡关系在新经济政策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得到改善。这种形势也驱散了诗人心中的疑虑和迷惘。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间,叶赛宁随新婚的妻子、美国舞蹈家邓肯到德、意、法、比、美等国观光。资本主义的“铁的密尔格拉德^①”同时给了他金元帝国的衰落和大工业的兴起这样两重的深刻启迪,使诗人在徘徊已久的城乡关系上获得顿悟,他在揭露金元帝国内幕的随笔《铁的密尔格拉德》(一九二三)一文中表示:“从此刻起,我再也不爱贫穷的俄罗斯……从这天起,我更加热爱共产主义建设了。”

① 果戈理一部中篇小说集的书名。

接着，出现了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这个创作高峰期，这是思想趋向成熟、艺术炉火纯青的阶段。从创作的数量而言，这两年创作的作品约占全部创作的四分之一；就创作的质量而言，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都攀上了新的高峰。这时的叶赛宁，思想矛盾虽依然存在，但毕竟已经画完了对于革命的认识曲线，由革命前的憧憬，到革命初的膜拜，到社会改造时期的怀疑，到由欧美观光和国内参观后的确信。这样，诗人对祖国的感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沉，观察现实的视野已经远远广于早期的乡村诗人和精神危机时期的“无赖汉”（自称）诗人。他以急起直追的姿态写下了大量使他得以跻身于伟大的时代歌手之列的优秀诗篇。如叙事诗《伟大进军之歌》（一九二四）描写了红军抗击尤登尼奇匪帮，保卫彼得堡的英勇斗争。诗人借用民间故事的韵味，采取今昔对比的手法，用把自己的荣耀建立在农民的枯骨上的彼得大帝作反衬，讴歌了为苏维埃而战的“那些穿皮上衣的共产主义者”：

为了可怜的人民，
他们生得愉快，
死得高兴。
他们决不把自由的彼得格勒城
交给敌人。

与这题材相近的还有：献给为苏维埃政权牺牲的巴库政治委员们的叙事诗《二十六人之歌》（一九二四），歌颂为反对沙皇专制而遭流放的政治犯的叙事诗《三十六个》（一九二四）等。

在歌颂革命的同时，叶赛宁在许多诗篇中讴歌了革命的舵手列宁，除抒情诗《大地的船长》等外，叙事诗中也有未完成的《风滚草》的片断《列宁》等。

叙事诗中反映时代最广和最深的是《安娜·斯涅金娜》（一九二

五)。这是诗人自认为写得最好的两部诗作之一(另一部是组诗《波斯抒情》)。在《安娜·斯涅金娜》中,诗人采用叙事与抒情水乳交融的手法,叙事主人公与抒情主人公(我)交叉或重叠抒写的技巧,用诗的形象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等各个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用诗的语言歌颂了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推翻地主富农的急风暴雨,完成了诗人毕生为之苦苦探索的农民在革命中的命运这一宏大的主题,解决了在诗剧《普加乔夫》中有待解决的归宿问题,这是叶赛宁在苏联文学史上所做的一大贡献。作品成功地塑造了苏联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农民革命家形象之一——普隆·奥格洛勃林,并且生动地勾画了农村中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典型脸谱。作品的描写角度也是新颖的,主人公是一个被革命的风暴抛到海外的地主小姐,情节的核心是她和抒情主人公之间被革命浪潮淹没了的初恋史。长诗以一个飘流海外而心向苏维埃的时代弃儿的赤子之心向读者暗示革命的威力和祖国的魅力。

抒情诗的创作,在最后两年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诗人除继续写早年即已纯熟的田园风景诗外,还频频写出以内心独白为主体的即景抒情的诗(如《苏维埃俄罗斯》,以和意中人对话为契机的书信体抒情诗(如《给母亲的信》、《给一个女人的信》等),这是由诗人因内心矛盾新的激化(同时意识到时代的召唤和自己的不中用)而抒写悔恨主题所要求的。叶赛宁第一个用诗的形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新旧交替时期人们心田里掀起的万顷波澜,他们的情感世界所体验的苦难历程。这是叶赛宁独特的自我表现,又是对大革命后新旧交替时代的侧面折射,与马雅可夫斯基从正面表现新时代的精神风貌相互补充,共同描绘了一幅完整的时代画卷。

叶赛宁的创作精美绝伦而又充满矛盾:他一方面写出了向往美好的抒情诗精品组诗《波斯抒情》(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另一方面又写了长诗《黑影人》(一九二五),出色地表现内心深处新我

与旧我激烈搏斗后的绝望情绪。叶赛宁毕生追求的艺术境界是情与美的交融，它们最充分地体现在《波斯抒情》之中。这里有美景、美人，更有美的心灵、美的情操、美的升华和对美的追求。但是，尽管他此刻已基本上克服了“精神危机”，可人们对他的成见、自己对往事的悔恨以及精力不济、健康状况等都在拖他的后腿，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说：“他相信革命，但不相信自己。”他把这种轻生的念头流露在《黑影人》中，后来不久，便在精神抑郁症发作的情况下自缢身亡，年仅30岁。叶赛宁之死是个悲剧，它虽然结束了叶赛宁的创作，但却开始了对叶赛宁的褒贬之争，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中期，才在评论界得出一致的结论，称他为“伟大的民族诗人”（高尔基语）、苏联诗歌的奠基人之一。这不仅是对叶赛宁个人的正名，也是对革命年代抒情诗对表现时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一次再认识。

叶赛宁虽然广采博收，但毕竟具有较多的意象主义的创作特色，他和英美意象派一样用意象来代替语言表达的细微的感情色彩，他和庞德一样特别喜欢用树的物象来表现人的情态。但是叶赛宁对意象的追求是与俄罗斯民间文学象征的传统相吻合的，他强调了意象的生活之源，从而较少形式主义的成分。他所独创的“叶赛宁意象体系”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正是因为他的诗歌不但凭靠天才的灵感，而且植根于民族的文化，并得益于生活之泉的滋润。叶赛宁带有若干意象主义特色的诗歌艺术大致具有三点特色：一、妙趣横生的通感手法，二、独辟蹊径的色彩象征，三、一唱三叹的主导意象。他的通感和象征手法都来自象征派，但又高出象征派，就连对意象的运用也和英美意象派有别。在他的笔下，此情此景的意象与彼情彼景的意象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叶赛宁的诗不仅应单篇地读，还应把它放到诗人全部作品的上下文中去读，才能彻底领会诗人每一个意象所包含的特定的象征意蕴（如重复出现过几十次的白桦）。

大自然的朋友、歌手和殉道者

正当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从我们地球上消失，一个接一个珍稀动植物物种濒临灭绝的今天，我们不禁想起叶赛宁这位在本世纪初就曾站在象征大自然的乡村一边与象征现代文明的城市作过可笑而可敬的抗争的俄罗斯诗人。他珍爱过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为大自然打过无数个惊叹号（赞美、叹息），为大自然打过无数个问号（困惑、焦虑），因大自然而给自己打上句号（以夭折超脱），与大自然划上了等号。

在一个世纪以前，叶赛宁带着对大自然的爱和忧来到这个世上，走过短短三十个春秋后，又带着对大自然的爱和憾匆匆离开了人世。对大自然的爱心和忧患意识使叶赛宁成为二十世纪世界诗坛上的怪物。法国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法朗士曾这样说过：“……不能使用通常对于合乎理智的人们所使用的尺度来衡量这位诗人，他享有我们并不享有的一些权利，因为他站得比您无比地高，同时又站得比您无比地低。这是一个无意识的存在物，这是一个一百年才出现一次的诗人。”这里所谓“站得比您无比地高”，就是指站在珍爱自然的高度预感生态环境日渐恶化的厄运。至于“站得比您无比地低”，当然是指以扭曲了的心态和耍无赖的手段向城市进行“报复”（如借酒浇愁等）。这大概就是他被一些人誉为“天才诗人”，而又被另一些人贬为“颓废诗人”（或“流氓诗人”）的个中奥秘吧。

叶赛宁这位被法朗士称作“一百年才出现一次的诗人”诞生至今已经一百余年了。一百余年，对于一位经历了生前与死后的风风雨雨和坎坎坷坷的诗人来说可谓漫长的岁月，但对于不断淘汰文化沙金的永恒的历史长河而言，不过是短短的一瞬罢了。站在二十世纪末的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二十世纪初和十九世纪末所经

历过的一切,许多难以置信的戏剧性的变化便会随思绪纷至沓来,叶赛宁的悲喜剧就是其中之一:昔日的“颓废诗人”变作今朝的绿色诗圣,昔日的“革命同路人”成为今天保护自然的先知了。

对叶赛宁评价上的这种变迁,说明了诗的价值取向依附于时代的审美趋向,也说明了诗既可以与时代同步,也是可以超越时代的,因为诗人不但要为社会歌唱,还要为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呼号。杰出的俄罗斯抒情诗人丘特切夫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写过“一切在我身上,我在一切之中”的不朽名句。叶赛宁的一生,正是这句名诗的诠释:叶赛宁在大自然的怀里,大自然在叶赛宁的诗中。

八十年代初曾在北京大学读过书的我国英年早逝的诗人海子在他所写组诗《叶赛宁》中曾这样抒发他对叶赛宁与大自然的感受:

星月朗朗
野花的村庄
湖水荡漾
野花!
生下诗人
湖水在怀孕
一对蓓蕾
野花的小手在怀孕
生下诗人叶赛宁

野花的村庄漆黑
如同无人居住
野花,我们的村庄公主
安坐痛苦的北方

生下诗人

谁家的窗户

灯火明亮

是野花，一只安详燃烧的灯

坐在泥土这黑色的灯台上

生下诗人叶赛宁

诗人，无论是俄罗斯的，还是中国的，对大自然都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亲和力，因为诗，无论是中国的或任何一个别国的，都是情与景的交织，都是人与大自然的对话。诗离不开大自然，大自然也离不开诗。是俄罗斯（首先是它中部的梁赞）的大自然给了叶赛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给了他悦耳的旋律和音响，给了他夺目的色彩和线条，给了他宽阔的想像空间。反过来，叶赛宁也没有辜负大自然对他的厚爱：他用诗给了俄罗斯的大自然以善解人意的灵性，给了它以醉人的含蓄的魅力，给了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高的审美评价。溢满诗人胸怀的大自然，也使得它自己的怀抱里充满了诗。我国著名诗人艾青高度赞赏叶赛宁拥抱大自然的诗才，说“他的诗是和大自然结合起来的，是和土地、庄稼、树林、草地结合起来的。他的诗充满了生活的真实的气息。他的诗，和周围的景色联系得那么紧密、真切、动人，具有奇异的魅力，以致达到难以磨灭的境地。正因为如此，时间再久，也还保留着新鲜的活力。”

大自然，是诗人最基本的审美对象，诗人的使命就是将自然美转化为心灵美和诗美。与此同时，出神入化的抒情诗人在使大自然进入诗中时，也使自己进入大自然。拿我国古典文论的术语来说，就是达到了物我不分的最高艺境。叶赛宁在俄罗斯诗歌中正是攀登了这样的高峰。当代著名俄罗斯诗人鲍科夫说：“叶赛宁，就是大自然，叶赛宁，就是心灵，叶赛宁，就是创造出人间一切美好

事物的伟大的爱。”另一位当代俄罗斯著名诗人多里佐说：“我不能设想我的青年时代可以没有叶赛宁，正如不能设想俄罗斯可以没有白桦一样。他也许属于数百年才出现几个的诗人之列：他们不但进入俄罗斯的文学，而且也进入俄罗斯的景色，成了俄罗斯景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犹如河岸的垂柳，犹如原野上的庄稼，犹如掩映在它们中间的彩霞，犹如俄罗斯的美女白桦。”

诗是心灵与大自然撞击的火花，没有心灵，就既不会有诗，也不会有诗人。但如没有大自然，诗思的火花便会迅即熄灭，诗情的泉流便会顿时枯竭。叶赛宁深深懂得这个奥秘，用诗不断探索这一真谛。如在《明天你早早把我唤醒……》一诗中他唱道：

我将歌唱你这位客人，
歌唱炉灶、公鸡和祖房……
我的诗中一定会流进
你那棕黄色母牛的乳浆。

在叶赛宁的诗中，不但流进了母牛的乳浆，而且加入了公鸡喔喔、小猫咪咪和家狗汪汪的合唱；不但颤动着遍地绿色的微微火苗，而且飞扬着漫天银色的纷纷雪花；不但消逝着往昔的悠悠云烟，而且闪亮着来日的璨璨星辉。大自然这个诗情之家和形象宝库，和叶赛宁联结得如此的紧密，以致革命的急风骤雨一到，他便从浪漫激情的云端顷刻间坠入精神危机的深渊，从他的笔端不禁流出哀哭乡村、诅咒城市、悲叹灵感与大自然同遭厄运的悲音来。这种情调在《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
在诗中吟唱简陋的木桥，
站在落叶缤纷的白桦间，